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第412期 13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8年7月4日

思想 文化周刊

陶渊明接受史

■张可礼

剑锋教授对陶渊明情有独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志趣，对陶渊明的研究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毅精神。剑锋于1995年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即开始读陶渊明，研究陶渊明，并以《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为博士论文题目，顺利地通过了答辩。1998年，他毕业留校任教，至今20年。20年间，他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生的基础课、选修课，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做过本科生辅导员，兼任过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在完成教学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同时，心中一直有陶渊明，同陶渊明研究相伴。他积年累月，锲而不舍。求新的志向，辛勤的劳动，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2002年9月，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由齐鲁书社出版。2001年12月，他以《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了批准。他白天忙，晚上常常“开夜车”。经过4年多的耕耘，课题顺利结项，于2005年10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早在完成《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时，就想向下延伸，撰写《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2009年2月，他以此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月获准立项。此项目，原计划3年完成。经过3年的努力，按计划完成了书稿过50多万字，本来可以结项，但他严格要求自己，知道书稿不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表述方面，仍有很大的修改余地。于是申请延期1年，做了两次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字数达到62万字。项目上报后，经由专家鉴定，获得了优秀的评价。剑锋在完成上述著作的同时，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文献》等著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达55篇之多。2016年6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直笺、李剑锋评《重定陶渊明诗笺》。20年间，剑锋出版的陶渊明研究的论著，特别是有关陶渊明接受史的论著，具有前沿性，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感到欣慰，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完成《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之后，又开始宏观思考，总体设计，纵向贯通，把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和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连缀起来，进一步修改充实。经过3年多的努力，形成了110多万字的《陶渊明接受通史》。《陶渊明接受通史》是剑锋二十年间研究陶渊明及其接受史的总结和提升，是他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志趣与劳作相融合结出的硕果，也是学术界期盼的一部著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深化型和开拓型两类。深化型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在此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深入，如同一眼旧井的深挖。开拓型著作的明显特点是前人想写而未及写、后人一定要写的必不可少的著作，如同新挖一眼井。综观陶渊明研究史，不难发现，《陶渊明接受通史》是一部属于开拓型的著作。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影响，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差异，但就总体而言，有持续的、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从南北朝开始，代代程度不同地都有对陶渊明的接受。在古代，主要体现在对陶渊明作品的整理和许多诗话类著述的品评等方面。在现代，有新的突破，诸如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钱钟书《谈艺录· 陶渊明诗显晦》，中华书局1961年结集出版的《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钟优民《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等著作，各具特点，各有创获，在内容和体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局限，以前关于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多限于某一点、某一侧面、某一时段，有树木，而未成林，特别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很少有论著涉及。以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既为“接着”研究提供了基础，也留下了很大的继续研究的空间。《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开拓，系统地梳理了1300多年的陶渊明接受史，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有补阙之意义。

研究古代文学有一个通则，就是应当以史料为基础。历代关于陶渊明的史料，繁富而分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搜集整理。系统的搜集整理始于60年代。重要的成果有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陶渊明诗文汇评》，1962年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这些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由于未及全面地搜集整理，也在很大程度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不愿意吃现成饭，没有走捷径，一直重视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在这方面，他本着“事不避难”的精神，付出了很多心血，努力做到广撒网，“竭泽而渔”。在没有网络和古籍数据库时，他耐心地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搜检各种文集。有了网络和数据库后，他又充分利用。他搜集史料，钩发沉伏，不限于古代，也涵盖了现代。不限于国内，也关注了域外。为了搜集史料，他阅读了“海量”的各种文集论著。他初步搜集整理的史料，达500多万字。他搜集整理的史料，相当全面，如：搜集了历代拟、效、和、集、律、用韵陶诗辞至少有1100多家，历代桃源诗作家至少有930多家，历代有关陶渊明的戏剧至少有35种。其中绝大部分史料是第一次揭示的。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到许多方面。以前搜集整理的史料主要是着眼于文学方面，剑锋视野开阔，拓展了史料的类型，由文学拓展到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在文学方面也有开拓，由诗文拓展到戏曲、小说等体裁。剑锋相当全面的搜集整理史料，不仅使他的接受史研究有扎实的依据，史料翔实，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新的史料引发出新问题、新见解。《陶渊明接受通史》第七编第五章，特设四节，分别论述了在绘画、小说、园林、书法等领域中对陶渊明的接受。这是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未及涉及的。

剑锋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过程中，在注重搜集整理史料的同时，一直伴随着学习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史料虽然很重要，是研究的基础，但史料是死的，是否能激活史料，正确地阐释史料，不能仅靠直感、悟性，重要的是还要靠理论的启发。剑锋注意学习多方面的理论。尤其重视学习接受美学、阐释学。《陶渊明接受通史》就是在他自觉地在所学的理论的启发下写成的一部著作。全书注意史论结合，没有离事而言理，没有随意性的主观臆测，努力体现史料和阐释“互为相塑”的密切关系。陶渊明在历代的被解读、被接受，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陶渊明接受通史》尝试纵向整体把握，长于论述历史变化的轨迹，梳理出一个系统，为读者全面地了解陶渊明接受史，提供了方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读本。全书在“绪论”后，把陶渊明接受史分为7个阶段加以论述。每一阶段的论述，注意在大量的史料中，选好典型，解剖典型，进而探讨每一阶段的特点。不少论述能由表及里，注意发掘史料背后蕴涵的诱因。如书中第七编第三章第六节对清代陶澍的论析。陶澍在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辑注的《靖节先生集》是历来整理陶渊明集的集大成之作。《陶渊明接受通史》把陶澍选作一个重点，用1万多字的篇幅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论述中，在肯定陶澍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和特点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了他取得成就和特点形成的根由。认为：“陶澍接受和研究陶渊明是在尊崇儒学、考据之学尚盛的嘉庆、道光年间，故其接受陶渊明多从儒家出发，遵循乾嘉学风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揭示的是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根由。此外，还特别揭示了宗族对陶澍研究、接受陶渊明的诱导：“他接受陶渊明还有家族的特殊条件和影响。陶澍把自己的家族归入陶侃、陶渊明一脉……以陶渊明的子孙后代自居，在宗法社会里，自然对陶渊明另看一眼。”《陶渊明接受通史》在纵述通史的基础上，还在最后的“余论”部分，分4节，总结论述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一些带有历代共同性的问题和启示，其中的陶渊明的仁爱精神、陶诗的经学化和意境化问题，都是此前学术界没有论及的重要问题。凡此种种，不仅为读者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思考和认识陶渊明，也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些启示。

《陶渊明接受通史》虽然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多有创获，但它毕竟是一部阶段性的著作。任何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只有结项和截稿时间，没有终结。《陶渊明接受通史》也是这样。书中已经论述的问题，有些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如：历代绘画、书法、园林、小说、戏曲中对陶渊明的接受，内涵丰厚，形式多样，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书中只做了初步的勾列，未及深入地探讨。对陶渊明接受史显现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等，书中虽然有所论述，但有待深化，进而揭示陶渊明接受史既有古代文学接受的一般规律，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陶渊明接受史是一条长河，从南北朝时期一直流淌到现代。剑锋在完成陶渊明接史古代部分的过程中，也关注了现代部分。现在他已经开始撰写现代部分。剑锋很敬业，很勤奋，又有长期积累的学养和不断进取的精神。陶渊明接受史的现代部分，一定能够完成。天道酬勤，我衷心期待着他的新的著作的问世。

“费孝通问题”：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麻国庆

恩师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文距今刚好30周年。就在几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了这一纪念会议。在会上我提到，费孝通先生留给学界的遗产是一座丰富而又多维的知识宝库，我们理解费老的思想也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展开。从经验的层面要从小社区扩展到大世界，从思想层面要关注先生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国思想体系的内部构造，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世界文明间对话的框架下，去理解费老的思想判断。所以，对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更离不开这一多维的框架，不应仅就民族而谈民族。

记得我第一次陪同老师到武陵山区调研，在车上他就说他一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汉族农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文章。2005年费老离开我们后，《开放时代》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于是我写了《费先生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化》。因此，费先生的三篇大文章涉及了汉族社会、少数民族以及全球化这三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个总的领域中，费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农村、中国工业向何处去？如何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调查、来认识多民族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在具体的社区研究中，如何处理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怎样通过文化自觉的转化，成为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知识构成的重要来源？中国文明如何贡献于21世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等等。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已经构成了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迈向人民的具体实践、全球和谐共生的理念等特征的总体性理论与实践。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费老的学术和应用，已经构成了总体性“费孝通问题”。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论思考以及理论升华，呈现了开放而又立体的问题意识和知识体系。背后是费先生对于人文价值、人文发展、现代性与美美与共的未来的思考。而且，先生的为人、为学，均十分谦和、包容。在北京大学和他读博士期间，以及后来留学回来北大工作后，他和我们讲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话，他要为我们后学破题引路，但开风气不为师。

对这个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思考和发掘，一直是我们几代学人努力的事情。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燕京学派”时期，费孝通先生身边的诸多杰出青年，就有通过共同调查和实践，去认识中国社会的理念。也因此产生出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1949年前的“黄金时期”：“魁阁学派。”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研究。

坦率地说，“魁阁学派”以及同时代的学人，与费先生的时空距离比较接近，费先生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到我们这一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的时期，很多现实研究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计划与市场、城乡二元体制、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格差等。在此背景下，费老的关怀更多地是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我在北大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城乡社会学”，博士生入学考题之一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讨论、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但我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魁阁”式的学术共同体。不过，费老早年的学术遗产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学术之路。

因此，我们这代人的研究，包括对费老学术思想的讨论，是和我们自身的学科训练与研究旨趣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知识体系在不断变革，要求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理解费老思想的整体性。近年来，我看到一些青年学者出版了数部研究费先生的著作，分别从社会治理、知识谱系、思想史、心态史等角度出发，提供了诸多鲜活的视角。如果说阿古什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很多学者，在认识费孝通的总体性命题时，习惯于将他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那么青年学者们从某个主题的角度出发展开的追问与思考，反而让读者有独出机杼、热情洋溢之感。如果费孝通的思想与实践能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议题相契合，那么说明他本来就超越了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局限。况且，在各种信息大繁荣的今天，青年学者同样有足够多的信息渠道，去理解费孝通以及他在20世纪各阶段的时代背景。所以，几代学人各有贡献，几代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聆听而非单向继承的关系。

《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的作者黄志辉是青年一代对费老思想的发掘者之一。志辉曾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随我硕博连读，他于2011年6月毕业后，就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6年4月，我也因为各种机缘调入民大工作，我们目前是在同一个学院工作的同事。这些年来，我比较熟悉他的一些学术考虑。在中山大学马丁堂的课上课下，他经常会和我讨论费老的研究议题、师承脉络；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我放了一套群言出版社的《费孝通文集》在那里，他和几位同门师兄弟经常人手一本，不断翻阅、讨论。志辉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珠三角世界工厂中的底层农业工人——代耕农群体，所以他非常关注费先生有关人口、土地、社会及变迁的论述。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编的《民族与社会》丛书中，出版了他的《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书中对“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的研究，接续了费老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具有理论深度。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的这七、八间，他也没有停止阅读费孝通。本书中的每一篇章，至少意味着他把《费孝通文集》第一至第十六卷从前至后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最近几年他还有其他的研究计划，但对费先生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过。

在与黄志辉讨论有关费先生的著述时，我逐渐知道他的几个有特点的立场，值得在这里一提。例如，他认为青年读者在阅读费孝通时，不应只是关注“文化自觉”“多元一体”等“大型”概念，而应考虑费老对于现实发展问题的具体实践方略和政治经济学维度。志辉认为，关注社会重建与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重要的学术思想表达，因为重建的实践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向要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中实现，就必须倚仗文化功能学与解释学。同时，要在田野中发现当地人的思想与文化逻辑。但如果过度的将费孝通的研究引向文化归纳学或社会哲学，就有可能与费先生的本意有所出入。

再如，《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两本书，黄志辉跟我说过数次他更青睐于后者，大致的理由是：《乡土中国》固然很重要，书中集结了天才般的灵感，但它最初毕竟是以一本教材面世的，书中的每个章节几乎都可独立，较为零散；但《乡土重建》不同，它是一以贯之的专著，对乡村工业化和合作组织的建设方案、乡绅地主的出路以及乡村政治治理的具体路径，都有系统、连贯而独到的分析。因此，志辉认为仅仅拿着《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礼治秩序”等等概念，来比照当下中国的城乡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应该系统的关注《乡土重建》《中国绅士》等著作中蕴含的丰富的乡村振兴思想。他跟我提过，他最喜欢的几本费孝通写的著作是：《禄村农田》《乡土重建》《江村经济》，再后就是《生育制度》《花篮瑶社会组织》《乡土中国》等。显然，他对民族志的优先趣味，影响了他对这些著作的排序。不过我同意的是，对于要迈入实证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说，如果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费先生提出的几个抽象概念，不如先从现实问题入手进行讨论，再回到抽象概念的思考路径，我觉得这样更有利于实证取向研究的发展。

本书的书名中有“先声”二字，音同“先生”。如果今天去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我们还能听到那里的老人一谈起“费先生”，就会眉飞色舞。但若是回溯至八十年前，开弦弓村人说“费先生”，可不是指费孝通，而是指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当年，费达生倾其家私，为开弦弓村的人设立现代的缫丝合作工厂，意图改善村内农民的生活，赢得了开弦弓人的信任，被普遍的称为“费先生”。对于农民和底层劳动者来说，那些最切实际、最接地气的知识分子，才容易被真心的唤做先生。二十多岁时的费孝通也将姐姐的公心实践称为“复兴丝业的先声”，可谓“能指”与“所指”的合拍。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被开弦弓村人称为“小先生”，这还是沾了姐姐的光。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了大先生。

费孝通被民间尊为“先生”，主要是因为他也关注富民实践，体察社会疾苦。他的早期文字中充满了苦难的重量，而在晚年文字中则洋溢着追求幸福的方向。诚如本书中的一章所论述的那样，中国以及中国的相关问题、发展方向，既是他的研究单位，也是他的问题域；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习惯于在中国文明的内发视野中，去研究与同时代政治经济体系适合的实践道路。他对开弦弓村、禄村、西南工厂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小城镇道路、各民族区域发展方向都给予了重点关注。总之，费孝通的各种先声实践，是他从老百姓中获得尊重的根源。

在本书中，志辉将费先生的经济实践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实践，而将早期的几本经典民族志称之为“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志辉看到了费孝通早期书写的惯习，并非只是受吴文藻、派克、马利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功能理论、社区理论、结构功能论的影响，雷蒙德·弗斯以及R.H.托尼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也强有力地影响了费孝通的文脉走向。因此，他将费先生的方法论总结为“文化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诚然，不论是在江村还是在禄村，我们确实都能看到费先生对“土地与地租”“劳力与收入”“资本与工资”等等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而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们必不可少的分析要素。不过本书作者总是提醒读者，费孝通对土地、劳力、资本的价值计算，从来都存在多种计算方法的来源。地方性的或中国文明内在的知识体系会提供一套价值观，世界资本体系会提供另一套价值观。只是当后者以霸权姿态和强势话语出现，前者就会受到挤压乃至毁灭。

本书不断提及的费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微观社区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指南，也是宏观世界的观察棱镜。黄志辉在开篇中这样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庸俗’的权力学说和简单的平等召唤，它的价值论立场和对劳动力、商品、土地以及资本的分析性关照，可以与民族志对‘人’与‘物’的深描结合，并且对各个区域中出现的民族政策实践、资本运作以及社会关系提出批判与反思。此外，民族志的文化视野可以矫正普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地方与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文化自觉道路。”在这样的表述中，我非常同意年轻人去追寻类似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技术分析去判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又通过民族志的文化解释路径，将技术分析拉回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基调中来，丰富当下中国民族志的新人文时代。

此外，本书还总结了费孝通的类型学。《费孝通文集》中出现的有关“城市”“权力”“家庭”“经济”“知识分子”等等类型，作者都作了一一梳理。将费先生各种零散的类型学系统表述出来，这是非常有益的工作。尤其是书中关于《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这一章，呈现了费老丰富的“城观”，在以往关于农村社区、民族走廊、地方区域等几种常见的类型学表述上，再次增加了重要的维度。费老有关城镇的主类型、次类型分析，被作者前后连贯的表述了出来。作者甚至比较分析了类型间的关系，烘托出“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发展伦理”这一重要学术判断，为当代的城镇发展提供总体性的参照。

总而言之，我比较同意志辉的判断，费老有关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类型学的表述，也是前述有关总体性“费孝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本书是入道不久的青年学人对经典思想的追索，作者希望站在费孝通的知识基础上，看得更远一些。虽然，本书中有些篇章的讨论还稍显不够深入、延展还不够充分，但是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努力、激情和对学术真谛的孜孜追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青年人对本土经典的解读还是太少了，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